

治学经历自述

邢公畹

我是学语言学的，虽然成绩微末，但学习从不中辍，而且兴趣盎然。我决定这样一个学习上的大方向，是在大学三年级，到今天已经有五十多年了。五十多年来，深感治学必须有坚强的动力，然后才能不中辍。祖国爱，故乡情，跟人民同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是一种坚强的动力。有了动力，还须有境界。在治学上应当不断地从旧范围里走出来，走向新的境界；不断地用旧东西培养出新东西。《荀子·大略》里说：“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也是这个意思。治学的总目的是探索宇宙间（包括人类社会）的某些规律，以便人去利用。至于具体学某一门学科，则常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对我来说，决定学语言学只是出于偶然的原因；但是想探索某些规律，则不是偶然的，现在不过是通过语言研究来进行这样的探索罢了。

我于1914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青少年时代都在这里度过，一直到1938年日本侵略军入侵，我才离开。这是长江中游的一个小城市，当时的里巷街道，风俗乡谈，我都非常熟悉。幼年喜欢出门走动，比如遇到捏面人儿的或是吹糖人儿的担子，可以看上半个小时。有一次，由父亲领着，出东城门，第一次看到长江，烟波万里，滚滚而来；气象万千，使我非常惊异。安庆是在南宋嘉定十年（1217）开始建城的，当时由于金人破光州，所以把安庆府治从潜山迁到现在的地方。潜山在安庆之西。在古代，安庆的西城区是商业发达、市面繁华的地方。到我的幼年还

在那里看到许多布匹、颜料、杂货批发字号，土机器纺织作坊，染坊，粮食行，炭行，油坊，生药铺，书肆，等等；还有酒楼，茶馆，客栈。清朝末年兴起的徽帮钱庄大多数也开设在西城区。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繁华市面也逐渐向东转移。西城区给我的印象，今天回忆起来，跟宋朝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所绘的相仿佛。

我家住在城东北区，在双莲寺和铁佛庵两座庙宇之间，大概这个地区在宋朝属阜民坊。双莲寺修建于南宋，有殿有塔，塔毁于明朝正德年间，殿毁于清朝咸丰年间。我经常从那里经过，只能见到遗址了。铁佛庵修建于明朝崇祯年间，殿宇宽宏，花木清幽，是我常去的地方。庙里有钟有鼓，对立于庙的两廊，都很大；钟比寒山寺的还要大一些。庙里和尚每天必于半夜撞钟，其声汪汪，常常使我失眠；因为生小家贫，家中越来越拮据的生活使我心烦，听不得这个“夜半钟声”；而这个钟声却从明朝末年起，一直响到我的幼年时代。

我出生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父亲失业，家里有几幢小瓦房，靠出租一部份房子度日。我能上小学和中学，是由于离家不远的地方有小学堂和中学堂，要是走读，花不了多少钱。

我进的小学叫第二模范小学，六年制。教师的素质多数都很高。当我上六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地理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叫何世玲，他热爱小孩子，大家也都喜欢他。他讲课，口齿、条理都很清楚；山川形势，都邑人文，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那时候，知识青年中有一股“曼殊热”（苏玄瑛，号曼殊，是一位诗僧，博学多才，通英、法、日、梵诸文，参加南社，有一定的革命倾向，但身世飘零，作品哀感顽艳，深得当时青年们的同情），何老师也不例外，所以当他讲到杭州西湖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介绍了苏曼殊的生平及其创作；还讲到他去凭吊曼殊大师墓的情况；并且为我们背诵了他自己作的三首凭吊的诗。他没用传统吟唱的腔调念，只是用自然语言有节奏地朗诵着：“一只白鹭掠湖飞，疑是诗魂化鸟归。怅

望碧空无限恨，青蒲绿水映残晖。”诗句平易，略加解释，孩子们都能听懂。

全班四十多个小孩子都静静地听着，沉思着。我第一次沉浸在诗的境界里，也第一次领会到中国语言的音乐性。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能把这三首诗背下来。有一天，有个同学悄悄地告诉我们：“何老师被枪毙了。我昨天看见他捆绑着游街的。人说他是共产党。”我们一下愣住了，等醒悟过来都觉得很悲痛。若干年后我才明白，何老师是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的。但在当时我们并不懂这些，何老师也没给我们讲过“共产主义”；我们只是觉得何老师是个好人，是我们的老师，敢于杀害我们这样老师的人一定是坏人。所以何老师被杀害这件事本身，对孩子们又起了某种意义的教育作用。

我从小学毕业以后的时期，在政局上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替代了军阀统治，我虽然考进了一所中学，心里头老是觉得国事家事，前途茫茫。我上的中学叫六邑中学，原为安庆府学堂。校内池塘竹树，楼阁亭台，风景绝佳。可借教师的质量多数都不高，我心里更加苦闷。这时候，我发现“书”可以告诉我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我所不知道的许多事情。一打开书，精神就有所寄托，使我能乐以忘忧。特别是在我进高中的时候，安庆建立了一所省立图书馆，馆长陈东原，曾著《中国妇女生活史》，颇见知于人。图书馆办得也很好，馆里从古代典籍到新出版的图书期刊（包括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的），搜集得比较齐备。人们不但可以在窗明几净的馆内阅读，还可以把书借回家读，于是我越发沉浸在书籍里。这只是胡乱读书，谈不上治学；但是这一时期的读书生活，对开拓自己的思想境界是很有帮助的。

我能上大学也是由于安徽省建立了一所大学——安徽大学，校址就在城东北区，我仍然可以走读（后来我于1945年2月16日在昆明听罗膺中先生谈，安徽大学的前身是清朝末年江彤侯创办

的安徽公学。安徽公学实际是一个革命机关。教员有严复、刘师培、柳亚子、苏曼殊等）。安徽大学第一任校长是刘文典（叔雅），后来因为他面斥蒋介石，而被蒋革职。我入学的时候，校长是程演生。我念的是中国语言文学系。一进大学，旧学新知，纷陈眼底，比起中学来另有一番气象。

今天回想起来，我从长胡子的老先生所开的课里受益并不多，如《群经选读》、《诸子选读》、《历代文选》、《历代诗选》、《词选》等。开《诗经》课的是桐城姚永朴老先生，是姚鼐的后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的讲授方法是先朗读，如果他兴致好就吟哦，然后串讲。讲解内容不离毛《传》、郑《笺》。大抵都是一些记诵之学，没有多少启发作用。有一天，先生讲到《商颂·那》，我心里想：《那》是商代祭祀鬼神的乐歌，行礼演奏，箫鼓追随，并执干戈为万舞，自是一种仪式。训“那”为“多”，不如训“那”为“雺”，“那”、“雺”两字同音，都是“诺何切”（当时我没有音韵学上的知识，今天从上古音看，“那”字江有诰、黄侃都列歌部，“雺”字《诗经》与歌部字押韵，如《竹竿》叶“左”、“嗟”、“雺”；而且“那”从“冉”声，古与-m尾有关；“雺”从“难”声，古与-n尾有关，两字都从有鼻音尾的原始形式变来，这又都是一致的）。我就站起来说：“先生！‘猗与那与’之‘那’，是否就是《论语·乡党》：‘乡人雺，朝服而立于阼阶’之‘雺’？”老先生一听，半天没言语。那是一个冬天，窗外的雪光反映在他的白胡子上，白胡子颤抖着。我没想到把他气成这样，深悔自己的懵懂。后来他看着我说：“你要这样说，你就这样说罢！”这是一句深恶痛绝之辞。因为“那”字历来训“多”；“那”篇为庙中祭祀成汤的礼仪，而“雺”则为民间驱逐疫鬼之俗，两无关系，历来无异说。不过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这位老先生的见解远远不如朱熹。朱熹认为：“大夫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至孔子编《诗》

而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阙文疑义，今不敢强通也。”我想，记问传经，数千年来，大概就是这样了。《群经选读》诸课倒不如周予同先生开的《群经概论》、《经学历史》的课能讲出一些新信息、新道理来。使我受益的课还有陈望道先生的《大一国文》、《文学概论》、《修辞学》；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目录学》；陈守实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许杰（士仁）先生的《文艺思潮》、《文艺习作》；特别是方勇（景略）先生的《文字形体学》、《音韵学》、《训诂学》。方先生是寿州人，诚朴好学，以所发表的《喻母古读考》一文见知于罗莘田先生。

那时候，我对系里开的课以及我所选的外文系的课固然都用心学，同时还是跑省立图书馆。将上三年级时，觉得不能再象这样古今中外的乱读，应该有个专业方向了。我就向老师们请教。许杰先生、陈望道先生曾支持我搞文艺创作。我试了试，当望道先生离开安大，回上海办《太白》杂志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儿时回忆》，登出来了，但以后没接着写。周予同先生却劝我攻历史，并且认为可以从《宋史》入手，因而我决心写一部有关宋朝风土人情的书。我从各方面搜集资料，工整地记了十多本读书笔记。但宋朝南北各地民族不同，风谣习俗，各有渊源，四百座军州，城市又不同于乡村，衣冠风物，都不宜断代叙述，只好搁笔。但是这十多本读书笔记成为我后来投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生的证明学力的材料之一。

上三年级后，我读了一些有关语言学和语音学的书（那时候，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上册也已经出版，这是一部观点和方法都比较新的书，我仔细阅读，并且详细写了笔记），对语言学开始感到兴趣。当时中文系既没有语言学的课，也没有语音学的课，外文系开了phonetics，实际只讲英语的发音，我选读了。到四年级，我写的毕业论文题是《中国古代民歌的拟似记音及其与安徽流行民歌的比较研究》，导师就是方景略先生。在这

篇论文里，我根据黄侃所拟的古音系统，用国际音标把《诗经·国风》里的诗句逐字标写出来。然后搜集在安徽比较流行的《山歌》，主要是安庆郊区、桐城、舒城、青阳、东流、寿县等地的，用安庆音记下来。在节律、用韵、章法等方面跟《国风》作出对比。但以后能不能攻习语言学就要看自己的机遇。刚好在我毕业的那一年（193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二组（语言组）招考研究生，南方北方各取一名，分初、复两试。初试审查大学毕业论文，大学四年中所学课程的细目、学分及考试成绩，大学毕业证书以及其他可以证明学力的文件（我交了那十多本读书笔记）。我顺利地通过了初试，接着就到南京鸡鸣寺路一号史语所参加复试。复试的科目有：语言学和语音学，汉学常识（音韵、训诂、文字等），外语和第二外语，口试（含听音、记音）。主考的就是赵元任先生和丁声树先生。复试科目中有的需要录音（如古文诵读，外语和第二外语），操作笨重的胶片录音机（那时还没有磁带录音机）的是杨时逢、董同和两位先生。交题目给我的是丁声树先生。题目很多，也不太好做。丁先生叫我别着急，慢慢做。汉学常识里个别的题目他还作了解释，比如：

“王”字《广韵》：“雨方切”，那就应该说成yuang，何以却说成wang？叫我好好儿想想。主持口试的是赵元任先生。先是记音，在一间办公室里面对面坐着，他发音，看着我记。辅音、元音，声调都发得很多。记声调的时候，他先把他自己的高中低三调发给我听，让我熟悉他的言语音域。记完音，他又提出许多问题，有的我至今还记得，例如他问我：“在学校里你最讨厌的是什么课”？我不假思索地说：“党义”。他看了我半天，补充说：“数学你讨厌吗？”我说：“不讨厌，很喜欢。”接着又问我：“研究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每月只有三十元的津贴，这事你考虑过没有？”我说：“考虑过了。我对语言现象感兴趣，愿意学习研究它的方法，愿意多读一些书。”

我回到安庆没多久，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书，非常高兴。求学的道路走到这里，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确定了此后的方向是语言学。

细想在这以前的读书活动也不能说没有目的。自己隐隐觉得是在解决两个问题：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应该具有哪些知识？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读书人，应该具有哪些知识？问题所包含的近乎清朝末年时务学堂的办学思想，前者包含经史百家之学，后者把从中学到大学的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都包含在内。实际上传统的知识和现代的知识两者加起来，其量之大，不是一个人所能负担的；何况传统的知识也还须经过分门别类的现代化的复杂加工过程。一个人只能取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专业，就好比一千条路，一万条路，一个人只能走一条一样。我从中学到大学的读书活动只是治学的第一个境界而已。王国维写《人间词话》引晏殊《蝶恋花》词句来描写治学的第一个境界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这个意思。还可以再补充两点：第一，基础知识越丰富，楼就上得越高，看得也越远；第二，千条路，万条路，都是为了探索宇宙间的（包括人类社会的）根本性的东西及其活动规律，以便于人去利用的。《周易·系辞》说：“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司马谈用这句话来解释六家要旨，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所谓“同归”、“一致”就在于“务为治”。“务为治”即是一种社会实践。所谓“殊涂”、“百虑”就在于“所从言之异路”。《史记索隐》说：“六家同归于正（公碗按：正者政也，‘为治’就是‘为政’），然所从之道殊涂，学或有传习省察，或有不省者耳。”

当我接到史语所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不久，又接到一封通知，上面说：“抗战军兴，我院各所人员凡于八月一日未到职者，

一律暂行疏散，台端自不能例外”云云。我只好到湖南西部的一所中学去教书，从此离开故乡。一年以后，在湘西看到报上登载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一则通告，上面说：董事会决定资助四名研究人员在国内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就读两年，其中有我的名字。我很高兴，立刻写信给史语所的赵元任先生（当时史语所已迁往昆明），要求利用英庚款的资助回所读书。那时候，赵先生已经到美国去了，由李方桂先生代理语言组组长。李先生写信告诉我，正在为我接洽庚款的事。我得信后，就用一年多的教书所得做路费，从湘西穿贵州，到昆明郊外龙头村，见到了李方桂先生。李先生给我开了一些必读书目，告诉我英庚款的事还须等待一些时候。比我早一届的研究生董同和对我说：“你赶快去找西南联合大学的罗莘田先生，他古道热肠，最愿意帮助年轻人，门路又多。”于是我就用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的修改稿为贄，跑到靛花巷联大教授宿舍去拜见罗先生，谈了谈情况，罗先生热情地说：“且先教书”，并介绍我到云南大学附属中学去教国文。半年后，罗先生写信告诉我：“英庚款事已成，你可以回所读书了。”这样，我就回到史语所，并且随所迁徙到四川李庄。

研究生的学习期是两年，导师是李方桂先生。史语所所藏有关专业的书非常丰富，所以这两年既有方桂先生指导，又有马学良（蜀原）、张琨（次瑤）两同学切磋，觉得自己是从旧的治学范围里走了出来，眼界顿然开阔，懂得了很多道理，总起来说有三点：

第一，语言学不能只凭书本儿学，首先要学会做田野工作，以取得大量具体语言资料。语音学（包括审音、记音技术）、语法学等是田野工作的基本功。如果对具体的语言结构（语音的、语法的）没有亲自分析的经验，是没法儿学好语言学的。

第二，汉语方言之间的音韵上的对应关系，可以和《广韵》（隋代定下的理想的标准读音系统）作对比，以求得从中古音到现代音的大致演变情况。另一方面，《广韵》的音韵系统可以用

具体的汉语方言去印证；这种印证可以逐渐分清公设性的复杂的《广韵》音韵“系统”的合成层次；又可以用来跟《诗经》韵脚和形声字的谐声系统对比，参之以明清以来古音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得出从上古音韵（周王朝的官话音韵）到中古音韵的大致演变情况；而陈述从上古音到中古音，从中古音到现代音的演变情况都必须建立在演变程式的合理推导上；而在实际工作的程序上，这种推导其实是建立在具体的现代方言的调查基础上的。

第三，只研究一种语言，不如研究一组有关的语言，可以看出这些有关语言各自在演变过程上的深一层的导因和相关线索。

我在史语所学习的第一年，李先生让我分析一种汉语方言及其中古音来历，接着就搞汉语上古音。到第二年，李先生对我说：“你得再学一种民族语言，马学良和张琨分别学了藏缅语和苗瑶语，你就学台语吧。”于是我就学台语（包括布依、壮、傣等族语言）。第二年下半年，李先生指导我在贵州惠水县调查了一次布依族（当时叫仲家）语言，我写出一个初步的调查报告——《远羊寨仲歌记音》，这样就结束了我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后来，李先生介绍我到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去工作，并且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教课如“大一国文”等。那时候罗莘田先生是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先生讲的课（如“汉语音韵学”、“汉藏系语言调查”等）我都去听，并且为罗先生做些助教工作。在治学方面又得到他的许多指点。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由冯文潜、陶云逵两位先生创办。研究室的刊物分甲乙两种：甲种是语言人类学专刊，乙种是综合性双月刊——《边疆人文》，都是油印本。专刊第一种就是我的《远羊寨仲歌记音》。成书后我寄给李先生，李先生说：“你做得真快！”正因为调查和刻印的时间都很匆忙，这个印本是有错误的，不过还是为以后的调查做了一点铺路工作。《边疆人文》很难吸引外稿，创刊号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是陶云逵的《大寨黑

夷之宗教与图腾制》，一篇是我的《台语中的助词luk和汉语中的“子、儿”》。我的这篇于1948年作了修改，又刊登于周予同先生主编的《国文月刊》第68期上。一卷二期仍然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是陶云逵的《西南部族之鸡骨卜》，一篇是我的《评埃斯吉罗与韦野氏（Esquirol, Jos. et Williatte, Gust.）《仲法字典》（Essai de Dictionnaire dioi-fransais.）》。这时，云逵先生因病逝世，但这个刊物仍然继续办着，而且得到不少前辈学者的支持，如罗莘田、闻一多、游国恩、向达、罗膺中、方国瑜、袁家骅诸先生都在上面发表了文章。

我从1943年开始，先后在云南省的罗平县、新平县、元江县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艰苦的语言学田野工作，调查了侬语、倮语、傣仂语、黑彝语，傣雅语，积累了不少材料，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很好的整理。

1982年，我把以前所写的论文选成一个集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较有影响的文章如：《诗经“中”字倒置问题》，原发表于《边疆人文》第一卷，第三、四期，曾经方桂先生称道。1947年作了修改，又发表于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36期；《台语中的luk和汉语中的“子、儿”》（见前）；《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大名冠小名》，1949年发表于《国文月刊》77期；《论调类在汉台语研究上的重要性》，发表于1962年《中国语文》1月号。以上三篇文章，方桂先生在写他的巨著《台语比较手册》时收在书末的《文献选目》中；《谈荀子的“语言论”》，发表于1962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第5版，已故语言学家洪诚在《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中曾加以肯定；《现代汉语和台语里的助词“了”和“着”》，发表于《民族语文》1979年第2—3期，常为中外学者所征引。但正如《语言论集》的《自序》所说：“三十多年来，风雨消磨，不能把全力放在科学研究上，因而进步也不大，觉得很对不起老师的教诲。而

今莘田先生墓木已拱，生死路殊；方桂先生则异域飘寄，解惑无从。其唯一可以复命于先生者，仅仅是虽经挫折，不敢因循而已。”

方桂先生于1946年赴美，先后在哈佛、耶鲁、华盛顿等大学任教授。曾两度回北京讲学。1987年在美国逝世。我则于1946年从昆明复员到天津，在南开大学任教。1949年天津解放，从此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非常高兴。1953年被派往苏联讲学。1953—54年在莫斯科东方学院任教授，1954—56年在莫斯科大学任教授。课务很忙，除了由于教学的需要对现代汉语语法有所分析外，壮傣语研究是无法进行的。1956年2月，苏联汉学家波兹涅耶娃（Л.Д.Позднеева）在莫斯科大学举行博士论文答辩会，苏联高教部聘我为首席“论文评论员”。1956年8月回国。回国后，我就进入《自序》上所说的“挫折”时期，这就是“反右斗争”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不想叙述我个人在这个时期的遭遇。但不管怎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端正了思想路线，找到了一条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我非常高兴。1986年3月28日，我郑重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四人帮”被推翻以后，我进行了将近二十年不能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写出好多篇论文，出版了好几种专著。

但是在科研道路上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曾在第15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上提出了一篇论文——《汉语遇蟹止效流摄的一些字在侗台语里的对应》。这篇论文虽然傅兹嘉兄曾经赞许，可是我自己却越看越觉得有问题。虽然论文是把两种侗语方言作为一组，水语、仂佬、毛南作为一组，龙州话、剥隘话、泰语作为一组，用广州话跟它们作比较的尝试，而且提出了一个“对应同源体系”的研究方法；但是除台语组外，其他两组都没有分别进行过综合研究，现在揉在一起跟广州话作比较，是找不出多少规律

性的东西的。特别是构拟部份，证据薄弱，说服力很差。

在国际上，1942年，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K. Benedict）已经提出一种新学说，认为侗台语跟汉语并没有发生学上的关系，应该把侗台语、苗瑶语归属于南岛语系。主要理由是：从“核心词汇”（Core Vocabulary）看，同一个词，汉语只跟藏缅语对应，不跟台语对应，台语只跟印尼等语对应。到1966年，他提出澳泰语的说法，轰动一时，中国也有追随者。有一位中年学者有一次写信谴责我：“侗台语和汉语并没有亲缘关系，你的做法只不过是侗台语的汉语音韵诠释。你走的是一条死胡同。”我读了信虽然心里非常沉重，但是我还是很感激他；因为如果他不告诉我，我是不知道人家对我是有这样尖锐的批评的。但是按照我多次进行侗台语田野工作中的直觉，汉语和侗台语之间的关系并不只限于“文化接触型”的词汇，但这种深层的关系很隐秘、很琐碎，我一时无无法把它抽出来、说清楚。我这时在科研道路上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心境苦闷，几乎恹恹成病。不过我相信，在“前上古”时期，中国各地都有或大或小的许多原始部落，但总起来只是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集团。这三个部族集团渐次融合，终于成为一个融合体。后世的汉族、侗台族、苗瑶族等都是来源于这个融合体的。所以我有可能把汉语、侗台语词汇中的“对应同源体系”找出来。我坚信这一点。这正是柳永《凤栖梧》词句里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1987年，我写完《红河上游傣雅语》这部专著（1989年语文出版社出版）后，总结我近来在科研上失败的原因是：第一，用来比较的词汇，除汉语和台语外，未经初步处理的太多，今后应当以较古老的傣雅语为主，以两种其他傣语和曼谷泰语为辅，来跟广州话比较，这样就容易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第二，急于去解决汉语、台语是否有发生学关系的问题，没有细想汉台两语中有许多有关系的字这一现象是许多学者都承认的，现在我只去探索、

分析这些“关系字”，先退一步就可为解除精神上的巨大压力；第三，白保罗先生指出台语跟南岛语有亲缘关系，这是值得推崇的。不过在科学研究上，向来是说“有”容易，说“无”难。说台语跟南岛语“有”亲缘关系，只要有几组过硬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要是说台语跟汉语“没有”亲缘关系，这就难得多，因为这要穷尽汉语和台语中所有可比较的字。所谓“核心词汇”必须发掘到上古时期，只看目前表面的现象是不行的。那么，从汉语说，不但要有现代汉语方言的知识，而且要有经史百家之学、特别是传统“小学”的基础知识。没有这些知识，侈谈汉语、台语没有亲缘关系或是有亲缘关系，都是很危险的。

我心里豁然开朗，把我的全部侗台语词汇卡片，以傣雅语为中心重新排列，然后试写出四、五篇论文。其中有一篇是《论汉语台语“关系字”的研究》，已在《民族语文》1989年1月号上发表。初步觉得这几篇论文不像前面提到的那篇那么空洞，是说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的。我于是感到一种获得治学上的新境界的快乐。

1988年12月20日，南开大学中文系为我举行执教50周年纪念大会。南开大学赠给我的《荣誉证书》上的题词为：“学贯古今，砚中春秋五十；薪传南北，帷下弟子三千。”赞勉有加，且惭且感。我于1938年即开始在中学任教，1942—46年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员、讲师，1947—52年任南开大学副教授、教授，1953—56任苏联东方学院及莫斯科大学教授。回国后曾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顾问、中文系汉语侗泰语研究室主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在校外曾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1949年10月在北京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被推选为协会理事，1989年9月30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特颁发从事语言

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以资鼓励。我于1956年回国后即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一名，后以政治运动未毕业。1981年11月3日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专业为“侗泰语族语言文学”。曾招收硕士生四名，已获硕士学位；又招收博士生一名，以质量不理想，未授予博士学位。目前指导博士生两名。

我离别故乡已经很久了，那是生长我、教育我的地方。旧游如梦，时常想念着。我从我的故乡认识了我的祖国。我热爱我的拥有数千年文化的祖国。我希望能进一步了解这些文化并有所发展和创造。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中文系

《新批儒林外史》问世

最近，陈美林教授将自己多年阅读和研究《儒林外史》的心得，以传统的评点方式，著成《新批儒林外史》一书，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12月出版，这是建国以来出版的当代学者评点的第一部古代小说。

与传统的小说评点相比，陈评显示出更多的独创性，这具体表现在其批评的系统性、学术性和科学性上。全书评点文字共10余万字，包括前言、夹批和回评三部分。前言概述《儒林外史》产生的社会背景、文学传统和作者的个人条件，并分析作品所包蕴的丰富、深刻的内涵及其新颖独创的艺术特色；小说中的夹批则是就具体情节，或分析作者所运用的艺术手法，或揭示作者所赋予的思想内容；回末总评勾勒情节发展线索、分析人物形象。这样，三部分各有侧重、互为补充，构成完整的批评系统。此外，批评文字与原著语言风格的近似性，读来也倍感亲切。

从版本上讲，《新批》本以最早的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各本，在校勘和标点上都倾注了评者相当多的心血。可以说，这是目前所见的《儒林外史》最完善的版本。

• 李忠民 •